

论花间词人的越地想象与书写

汪 超

《花间集》作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历来备受关注，研究积累丰厚。近年来多有学者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推进《花间集》的研究，如赵惠俊、刘帼超从文学内部探讨地名意象；而李定广、李博昊则结合地理认知讨论文学问题，均有所获¹。不过，如果我们把花间词置于唐五代词的文本世界展开分析，或许可以看到更有趣的现象。

据赵惠俊《〈花间集〉的地理意象》统计，《花间集》中72首作品出现地理意象笔者统计书中含有江南“越地”相关意象的词作22首²。该结果看似平平无奇，但若翻检《全唐五代词》，就会发现花间词人是这个时期最集中、最频繁提到越地意象的词作者群体。而且大部分花间词人并非在越地书写越地，其创作带着虚设与想象。此种想象不但体现出词人们的空间感受、地理认知，也展现出颇多有意思的文本生产、衍生问题。

一 花间词人地理认知与“越女”语汇系统

地域书写首先体现在作家们对所描写地域特征的体认。花间词人的越地书写与想象建立在他们对吴越地域区块的差异性认知的基础上，他们通过越地历史、人物、特产的知识性呈现将越地与吴地等其他地域区隔开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西施”为中心的“越女”语汇系统，从而影响到花间词的文本面貌。

“吴越”是江南的核心区域。江南指涉的范围或许有时代差异，但唐人混称吴越，以苏浙的“吴越”指代“江南”的例子俯拾皆是。甚至明明是咏唱越地的诗歌，字面也用“吴越”。孟浩然《自洛之越》，见诗题而知其目的地是“越”，他却咏出“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的句子³。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也是以杭州的吴山泛指江南群山。再如白居易《忆江南》组词，以“江南好”总写江南之美，又以“江南忆”两首分叙苏州、杭州，而苏、杭正是吴、越的大城。张伟然指出“尽管他曾声称‘苏杭自昔称名郡’，但将苏杭相提并论，并以之作为江南诸郡的头牌，其实出自他本人的品题：‘江南名郡数苏杭……’”⁴。略晚于

白氏の袁郊《竹枝词》也混称吴越,其“吴越山川游已遍”仍然将“吴越”用作“江南”的代称⁵。这也说明至少在中唐诗人心中,吴、越之间的文化属性趋同,二者分殊尚不清晰,越地并未被视作独立的地理文化空间。

不过,花间词人从温庭筠开始就对“吴越分殊”有清晰的表述。温氏《菩萨蛮》其十四下片想象西施入吴后的情境,道:“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词人代言西施愁情,通过故国与吴宫的空间距离表明其愁所自,特别注意到吴、越的疆域之别。又如薛昭蕴《浣溪沙》其七的下片⁶: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平湖。

前两句对仗互文见义,但以“吴主”对“越王”也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区分吴、越之差异。花间词人对吴越分殊的地理认知甚为明确,并在创作时特意将越地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区块加以叙述。

而与花间词人同时代的其他词作者,只有南唐的成彦雄在《杨柳枝》词中提到吴越分殊,其云:“勾践初迎西施年,琉璃为帚扫溪烟。”⁷这也是唯一一例将西施与勾践挂钩的唐五代词,作者注意到西施入吴前后区别(亦即“吴越分殊”)。不过该词吟咏本题,是写春日柳枝的样貌。在涉及吴越分殊的地理认知方面,非花间词人至少要到年辈与孙光宪略近的成彦雄才触及相关表述,而花间词人却从温庭筠开始就一以贯之地了然其事。此种地理认知还形成了一套以西施为代表的“越女”词汇系统,进而影响到花间词人的文本生产。

花间词人最初以“西子想象”表现“吴越分殊”,通过西子在越地的居所、入吴的生活空间表达吴、越之间的区域差异。刘昉超曾举前引温庭筠《菩萨蛮》其十四以及和凝《临江仙》(海棠香老春江晚)等为“在非咏史词中,古迹地名被作为艳情典故使用”之例⁸。事实上,她所举的例子多与西施故事直接相关。西施是“越艳”的代表,承载着词人的艳情想象。同时,西施故事也是花间词中以“越女”代称美人的起点。温庭筠《菩萨蛮》其九:“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河传》其二:“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以西施曾生活的越溪曲、若耶溪代美人所居之地。这固然是地名作为艳情典故使用,但前提仍是西子的越人身份以及西施本身美艳传说的符号化。薛昭蕴《浣溪沙》其七亦然,他说:“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姑苏,即姑苏台,为吴地旧迹。范成大《吴郡志》载:“吴王夫差筑姑苏

之台，三年乃成。”⁹薛昭蕴想象西施入吴之后的生活，写其饱含家国之恨，泣泪滴血。“姑苏”通过“西施”的联结关系，也成为“西施”符号的一部分，成为“越女想象”的一部分。皇甫松《杨柳枝》其一则说：

烂熳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

这是首咏古之作，作者站在后知视角，写想象中的吴地。起句之“水国”，因次句“吴王宫殿”而被限定地理空间。作者说秋去春来，今时柳、莺仍在，而昔日西子已经消失在滚滚红尘中，平添一种虚幻感。到了花间第三代词人欧阳炯，依旧在怀古词中书写西施故事。他的《江城子》词云：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咏金陵用“六代繁华”是唐人遗韵，而姑苏台、西子镜均用西施入吴的典故。这些文本都通过西施入吴前后的叙述区分了吴、越的地理空间差异。重点是花间词人笔下，相关语汇最终形成一个想象系统，成为花间词文本生产的惯套。这一语汇系统包含西施、西子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词汇（地理名词比如苧萝、若耶溪等实际地名，越溪曲、越王台等虚化地名；物质名词比如越罗、越禽、越梅等），甚至泛指“越女”。

相较其他物质名词，“越罗”也被花间词人刻意突出，成为“越女想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不能否认花间词仍以书写闺阁、女性主题为主，而衣饰妆容恰是相关主题较多描摹的内容。在文学作品中，以衣饰的材质表示主人公身份的现象由来已久。《花间集》写到丝织品“罗”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不过，其中大部分都只以绫罗的色彩、图案、质感来形容，例如画罗、麝罗、绣罗轻、云罗雾縠等等。此外，以“罗”为形容词修饰名词，形成偏正结构的词组，如罗胜、罗袂、罗袜、罗衾、罗幌、绿罗裙、碧罗衣、黄罗帔等等。这些都与地名毫无关系。但以地理名词为定语修饰丝织品的，遍检花间全集也仅有巴锦、吴绫与越罗三种，其中巴锦、吴绫都仅仅一见，而越罗被提到六次。

此外，花间词人“越罗”书写的质量也高于巴锦、吴绫。张泌《浣溪沙》其七写女主人公，“人不见时还暂语，令才抛后爱微颦，越罗巴锦不胜春”。巴锦与越罗都成为女主人公难以描摹的佳丽气质之助力，但张泌并未对织物细节有更多的呈现。薛昭蕴的《醉公子》上片以铺叙之法，一一叙

述主人公的容妆、室内装饰，词道：“慢绾青丝发，光研吴绫袜。床上小熏笼，韶州新退红。”词中的吴绫有细密的质感和作为实物的名称表达。词人们写越罗，其细节呈现就更为丰富了。写越罗之颜色的，如温庭筠《归国遥》：“越罗春水绿”，李珣《浣溪沙》其一：“越罗衣褪郁金黄”；写越罗之长度，有孙光宪《竹枝》其二：“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写越罗的质感，有尹鹗《杏园芳》：“含羞举步越罗轻，称娉婷”。可知词人们对越罗的细节呈现是远远多于巴锦、吴绫的。可是花间词人何以独独钟情于越罗呢？其原因或是西子浣纱的传说激发吟者听众的艳情想象。因花间词中的“罗”意象总与女性事物关联，而越罗或许让受众更容易联想到越地浣纱女子西施的故事。鲍溶《越女词》就说：“越女芙蓉妆，浣纱清浅水”¹⁰。反倒是巴、吴二地相对较少令人产生相关联想的女性历史人物。因此，“越罗”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越女想象”的语汇系统。而当注意到吴越地理分殊的花间词人，似乎也更有可能使用“越女想象”营构其曲子词文本。

“越女想象”的语汇系统看似唐诗常客，李白《越女词》就是以若耶溪开篇。而杜甫《壮游》记叙游历越地经验，不但有鉴湖、剡溪、天姥山，更留下“越女天下白”的印象。唐人诗歌其他越地书写亦所在皆是。但在唐五代词家中，花间词人之外，仅四人五阙提及越地意象。其中张志和《渔父》两阙一笔带过“钓台”、“霅溪”地名，再加上三人三阙涉及西子故事。涉及西子故事者，除前文所述成彦雄之外，另两首都是以西施地名意象生发美艳想象的。一是唐昭宗李晔，他在《巫山一段云》中写到“苧萝山又山”¹¹；另一首是云谣杂曲子的《破阵子》唱到“正时越溪花捧艳，独隔千山与万津”¹²。诗中常见的语汇、典故，花间词人以外的唐五代词家却极少使用。这或许是个有趣的现象，至少说明花间词人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文本生产方式有一定差别，《花间集》文本的内部具有某种紧密的连结。

二 《花间集》越地文本网络的自足性

唐五代时期，越地虽然也是文人们乐于书写的区域。但在大“江南”视野下，越地相对不如金陵、姑苏那般具有历史的话题性；又不像潇湘、洞庭那样具有僻远的冲击性。因此，书写越地主题的作品远未堆山积海。

花间词人却是当时词人中最关注越地的群体。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越地书写的作品之间的文本关系。

从花间词人们书写越地的作品看，其彼此似有微妙的文本间性。且看以下三例：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薛昭蕴《浣溪沙》其七）

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苹叶藕花中。（牛峤《江城子》其一）

含情遥指碧波东。越王台殿蓼花红。（欧阳炯《临江仙》其一）

这三例，均以相对阔大的水域起句，承续历史遗迹“越王（台）殿”，再接以生长于水中或水畔的开花植物。“吴主山河空落日”虽然与后一句是互文见义，但在文本呈现上与后两例极其相似。所举牛峤、欧阳炯之例，字面有三分之一相同，甚至连韵脚都相同。至于碧江、碧波，宫殿、台殿，藕花、蓼花，从意象涉及的品类上说也是全然相同的，语词上不过小异而已。薛昭蕴、牛峤年辈相仿，欧阳炯入宋。今已无法判断究竟谁是首唱，但其文本写作的相互影响是非常明显的¹³。

在吟咏对象并非越地的花间词中，我们仍可看到这三例的影子。如李珣《南乡子》其九有“越王台下春风暖。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同组词其十有“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之句，其句字面依稀呈现薛、牛等人的影子。越王台、越台几乎就是这组互文文本的翻版。虽然《南乡子》其九没有出现“水”字，但“岸”字依然留下了相关痕迹。李珣这组岭南风土词，依稀沿袭了其前辈越地想象的花、水、古迹三重组合。

再看一组以“杨柳”、“越女”相互绾合的例子。温庭筠有两阕相近的越地词：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菩萨蛮》其九）

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河传》其二）

从内容上看，这两阕都是闺怨之词，意脉相通：西施故家、柳树、待不到的归人。越溪曲、若耶溪是以地名代指西施，又以西施代指闺中人。闺中人在春归之后盼行人归来而不得，见杨柳色、柳堤，皆生发折柳送行的联想，而“君不归”，“不闻郎马嘶”其意相同。除此之外，温庭筠

《杨柳枝》其三写道：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

这首大体袭用了上两阕的意群组合，不过人事上略有变通。本首将“越女想象”语汇系统中以“西施”代指闺中人改成了以“苏小”代指。柳丝、黄莺与美女的叙述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皇甫松《杨柳枝》的基本叙述结构与温词基本相同，其词云：

烂漫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

柳丝、黄莺与西施绾合成词，不过将历史遗迹吴王宫叠加叙述。春再归来，史迹犹存而逝者不归。一股淡淡的历史沧桑感漫出词篇。此阕综合采用了以上三首温庭筠词作的意象群，与温庭筠《杨柳枝》其三、《河传》其二在意脉上何其相似。牛峤《柳枝》其二似又从皇甫松的文本字面翻出，其词道：

吴王宫里色偏深。一簇纤条万缕金。不愤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

该阕吟咏本调，是一首咏物词。以柳枝低垂，想象柳树不甘被苏小小比下去，因而垂下万缕金丝绦。吴王宫、柳丝与传说人物苏小小，其因袭痕迹并不难发现。

由此，我们已见花间词人越地书写有较为鲜明的特点，文本之间的叙述逻辑、主题内容常见耦合。那么唐五代词的其他文本，是否也有与《花间集》相似的叙述模式呢？

我们在《全唐五代词》正编中很少见到书写越地的内容¹⁴。张志和《渔父》组词最早提到越地，其二“钓台渔父褐为裘”，其三“雪溪湾里钓鱼翁”写到的严子陵钓台与雪溪均是越地地名¹⁵。但整组作品受主题限制，表现隐逸者散澹潇洒之情，故而较少出现花、美人，与花间词人越地书写的文本间性距离较远。

敦煌词中唯一写到越地的词是《云谣杂曲子》所收《破阵子》，词道：
日暖风轻佳景，
注莺似问人。正是越溪花捧艳。
独隔千山与万津。
单于迷虏尘。梅雪落停愁地。
香檀枉注歌唇。拦径萋萋芳草绿。
红脸可知珠泪频。鱼笺岂易呈¹⁶。

这是一首闺怨之词，女主人公思念的对象是戍边战士。不过，词文本

中仍然出现了黄莺、花、越溪等意象。且黄莺取其声，与花间词人所写的“莺语”、“黄莺不语”、“黄莺长叫”涵义无别。可以说，在文本之间虽存在着某些“血缘关系”，但敦煌词中却仅此孤例。

五代词中，花间词以外也很少用历史上的知名女子来指代美女。南唐词人仅仅李璟、冯延巳、徐昌图三人的作品提到地理名词，且均与越地无涉。冯延巳是南唐词人中存词数量最多的，他的书写主题与花间词大体相近。但冯词大部分以室内、庭院为叙述背景，公共场所的叙述几乎不涉及历史名胜与人物，也很少以水中植物结篇。因此，在文本关联上，与花间词的越地书写之作有较大差异。

与花间词越地文本“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仍属白居易《杨柳枝》。这一组作品前后相连，在《白氏长庆集》《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等不同的文献中曾分别被冠以“杨柳枝词”“乐府诗”、“绝句”等文体出现。其中前八首收在《白氏长庆集》卷三一，可知白居易是将其作为组词看待的。这八首词前后之间有较为明显的起承关系，例如其四写到“馆娃宫暖日斜时”，其五即道：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其六紧承末句而起，道：

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¹⁷。

不得不说，这是与花间词越地想象文本最为接近的唐五代人词作。以柳丝牵连钱塘苏小小，咏柳而及传说中的人物。白词用特定人物指代美女，在唐词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既然从词体文学内部看，花间词人越地书写的文本与同时代其他词作的互文性较弱，它们几乎是在独立地完成了一套越地想象的语汇系统、结构模式。那么，在花间词人其他文类的创作中，有无相近的文本呢？鉴于花间词人大部分传世作品的文体是词，有些作者如尹鹖、李珣、阎选等均只有词作传世，我们拟以诗词均多有流传，且曾在越地生活的温庭筠、韦庄为例考察。

温庭筠在诗词创作中，语汇、成句互用是较为明显的，其诗中有“满楼明月梨花白”（《舞衣曲》）之句¹⁸，词中又用“满宫明月梨花白”（《菩萨蛮》其九）。但具体到越地语汇系统，温庭筠诗歌更偏向书写男性，

比如他诗中写越溪、若耶溪就不再生发“越女想象”，而是与渔父生涯相关联。《西江上送渔父》就说：“如逐严光向若耶，钓轮苓棹寄年华。”《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又有“越溪渔客贺知章”之句¹⁹。而提及越人时，也几无“越女”的用例，反而常提“越僧”。至少在温氏的越地书写中，我们看到了诗词表现对象的差异。韦庄的诗词表达差异虽不甚明显，但细究起来仍然有所区别。在韦诗中，西施的传说不仅仅用来写美女，也用来咏物喻花，比如“西子去时遗笑靥”（《叹落花》）；用来写江湖之思，比如“曾向五湖期范蠡，尔来空阔久相忘”（《赠渔翁》）²⁰。这在韦庄词中就没有出现过。温、韦二人自身诗词文本之间的关系似乎远没有花间词人相互的文本间性关系更为紧密。

从比例上看，《花间集》是同时代越地书写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文本系统，且其文本间有较为密切的互文关系。因此，笔者以为《花间集》的越地想象形成了一套较为封闭的文本网络。而这一文本网络在词汇、结构上具有内在自足性，不但与同时代的其他词作互文性较疏远，且与作者本人诗歌文本间的联系也不强。

三 《花间集》越地文本风貌的形成及其词史意义

《花间集》明确写出越地意象者固然仅 22 首，唐五代词明确写出吴地意象的也仅 24 首。这 24 首中花间词人又占 11 首，其中还有 5 首是与越地意象重合的，单独写到吴地意象的仅 6 首。泛称“江南”的词例则不在为我们的统计中。细看这些“吴越分殊”相对明确的词作，越地文本是明显出现了语汇系统的，但吴地的意象呈现则更加分散，内在叙述逻辑也更加混乱。那么，《花间集》越地文本为何形成如此风貌？

从外在原因看，温庭筠、韦庄等以北方士子游历江南，采取他者视角观看吴越地域。故而有较丰富的江南生活经验，描写吴越地域的细节也颇有可观。所以，在温庭筠、韦庄的越地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竹风轻动庭除冷”、“烟浦花桥路遥”、“碧沼红芳烟雨静”等南方风景的感官叙述。这些叙述与南唐、吴越的文人词几乎无甚差异。但温韦作为他者，会不经意写出地理名词，而吴、越本土词人长期生活在当地，或许并不觉得当地地理方位需要突出。因此，他们描写当地景色，

是书写目之所接、眼中所见，故而不特别标明。这一点，不论南唐君臣，还是吴越词人都是如此。南唐词人除李璟、冯延巳、徐昌图外，词作中甚至完全没有明确的地理名词。冯延巳词也不写历史名胜与人名。

此外，五代时巴蜀与越地交通艰难，《旧五代史·司马邺传》记载：“时淮路不通，乘驢者迂回万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²¹可知，彼时吴越与前后蜀政权之间山水相隔，一度曾因后梁与杨吴对峙，而道路不通。两地人员往还受限，商贸交通受阻，需要远出荆楚，绕道岭表，泛海交往。从或客观上引发了花间二、三代词人越地的陌生化，而作家对于陌生对象的想象空间也更大，或许也更有书写兴趣。所以我们看到花间词人写越地意象远超当时其他词人，而他们写吴地意象也占到唐宋词人明确写出吴地地名、典故的45%弱。

从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可能会说他们受到了越地书写传统的影响。因为，与花间词人类似的叙述的确是有众多前文本的。唐人怀古之作咏及吴越故事者多涉及西施入吴之事。尤其是姑苏怀古之作，如李白《苏台览古》、皎然《姑苏行》、刘商《姑苏怀古送秀才下第归江南》，其例甚多，稍检即得。而专写西子人物的咏史之作，作品量也不少，如李白《越女词》、包溶《越女词》、于濆《越溪女》、苏振《西施》皆其例。被认为是花间词人沿袭对象的罗虬《比红儿诗》也有相应的叙述，其九道：“越山重叠越溪斜，西子休怜解浣纱。”²²前代文学家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文本，直接浸润了花间词人的笔端。

从现有唐五代词文本的情况看，西蜀由于《花间集》的编纂，保留了相对可观的作品量，但南唐以外的其他割据政权所留下的词作就少得多。撇开文本流传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西蜀、南唐及同时代的文本虽有多元主题，也有不同风格，但相较早期词作（不论是敦煌曲子词也好，还是唐人诗客曲子词也好）其审美婉约化、对象狭小化、抒情普泛化的趋向都是非常明显的。唐人戴叔伦《转应词》（边草）、敦煌词《赞普子》（本是蕃家将）之类边塞词的宏阔场景展示、豪放叙述风格倏忽不见了。甚至于实用化的易静《兵要望江南》也无从觅迹。而在越地书写的部分，张志和《渔父》组词是大历九年左右，湖州太守颜真卿主持的文会上唱和之作，会后张志和又依词作绘制词意画²³。虽然这是在越地唱和的作品，但仅可见的二十一首和作均与越地无关²⁴。张志和所作二首主题内

容与越地地名的空间限制关系不大，若将词中“钓台”改成别的地名事实上也是成词的。但从风格上说张作是接近于温庭筠越地书写的诗歌的，而温飞卿五首涉及越地意象的词作恰恰都是不同于其诗歌叙述风格的委婉之作。温庭筠诗词文本的内在差异，足以说明唐人自身就已经注意区别诗、词的体性。正如王兆鹏师所说“词体一开始就呈现出诗混合的迹象”，而“温词的出现，标志着词体从传统的五七言诗歌中分离独立出来，宣告词体的定型与成熟”²⁵。而在沢崎久和《〈花間集〉における“沿襲”》总结花间词人4类沿袭对象，温庭筠词、同济之词均被列在其中²⁶。这种沿袭模仿看上去是花间词人主动施为的，而这种模仿带来了花间词人越地书写有别于唐诗的取向。他们在重新塑造词体体性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突出了“越女想象”语汇系统。花间词人群体起而效之巩固了温词创作的文体实践成果，稳定了“花间范式”的基本特征。不妨说花间词人越地书写面貌的形成主要是词体独立进程中，花间词人内部认同与主动模仿的结果。

而花间词人内部主动模仿的理由，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花间词的创作背景。饶宗颐先生说：“敦煌谱所显示の場合，必为歌筵上酒之用。……我故谓《云谣》与《花间》《尊前》本是一脉相承，仍是属于乐章舞曲一类。”²⁷《花间集》与《云谣集杂曲子》《尊前集》诸词一样，都是歌筵上酒之用。创作目的即为乐章舞曲，写作场合也可能是歌筵上即席所为。而花间诸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多在相近的时间生活在相近的区域，即便孙光宪也是蜀地所出。因此，彼此间很可能传唱同一批曲子词。“一个诗人不需要考虑之前的任何一首具体的诗歌，因为他读过或听过很多‘同一类型的’诗歌，熟知很多遵循某种程序的诗句。就和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一样，很多具体的语言表述累积起来，就会指向一系列的语言可能性、规律和习惯。”²⁸宇文所安的这段话，或许正可以解释《花间集》内部文本高度耦合的面貌，也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花间词人会成为当时用越地意象的最多的词人群。但是否有更多、更深刻的影响因素，还值得我们继续考虑。

注

- 1 赵惠俊《〈花间集〉的地理意象》，《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2期；刘幅超《〈花间集〉的南方地名的艳情色彩》，《理论界》2017年第6期；李定广《“花间别调”与晚唐五代蜀粤商贸活动》，《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李博昊《论蜀之地理形势与〈花间集〉的词调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 2 本文所引词作均出自李一氓《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3 [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 4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1页。
- 5 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6页。
- 6 薛昭蕴，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认为当作“薛昭纬”（文载陈著《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而《全唐五代词》以为“终无确乎不拔之证”（第494页），可参。
- 7 《全唐五代词》，第719页。
- 8 刘幅超：《〈花间集〉的南方地名的艳情色彩》，《理论界》2017年第6期。
- 9 [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 1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16页。
- 11 《全唐五代词》第183页。
- 12 《全唐五代词》第808页。
- 13 这种文本“沿袭”现象在《花间集》中十分常见。村上哲见曾说：“在蜀词人的大部分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窥见那模仿的痕迹（超按：指模仿温庭筠）。”（氏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沢崎久和《〈花間集〉における“沿襲”》（《高知大学学术研究報告》第三十四卷，1985年）准此论，专门分析过《花间集》内部，以及《花间集》与唐诗之间的“沿袭”现象，及其文本操作方法。我们主要关注花间词人对特定地域的书写，亦即越地想象文本的构筑。
- 14 《全唐五代词》以文体明确的作品为“正编”，但文体难断，或历代总集误收的声诗与徒诗作品列为“副编”（《全唐五代词》第22页）。

- 15 《全唐五代词》第 26 页。
- 16 《全唐五代词》第 808 页。
- 17 《全唐五代词》第 67 页。
- 18 刘学楷：《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8 页。
- 19 《温庭筠全集校注》，第 402、443 页。
- 20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174 页。
- 21 [宋] 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 册，第 279 页。
- 22 [宋] 计有功著，王促鏞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六十九，巴蜀书社 1989 年版，第 1842 页。
- 23 唐人沈汾《续仙传》道：“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十七“玄真子”条引，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80 页。）
- 24 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附录《唐著辞纪事》收 20 首（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6-287 页），《全唐五代词》收张志和兄张松龄一首。
- 25 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 26 沢崎久和：《〈花間集〉における“沿襲”》，第 84 页。
- 27 饶宗颐：《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58 页。
- 28 [美] 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等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17 页。



汪 超 (Chao Wang)

武汉大学文学院准教授。主に詞学、宋代文学と文献等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る。主な著書と論文に、『明詞伝播述論』(中華書局、2017)、「北宋士人の師承と文学」(中華書局、近刊)、「柳永詞のテキスト重複及びその伝播効果についての試論」(『文学遺産』3、2022)、「路岐での回顧—内藤湖南の漢詩における清人と遊清」(萩原正樹編『日中韓文人交流と相互理解—明治大正期の詩詞を通して』、あるむ、2020)等がある。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词学、宋代文学和文献等。主要著作有：《明词传播述论》(中华书局，2017)；《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中华书局，近刊)。主要论文有：《试论柳永词的文本重复及其传播效果》(《文学遗产》3，2022)；《路岐的回望：内藤湖南汉诗中的清人与游清》(萩原正树编《日中韩文人交流与相互理解—明治大正时期的诗词》，あるむ，2020)等。

우한대학 (武漢大學) 문학원 부교수. 주로 사학 (詞學), 송대 문학과 문헌 등에 대해 연구하고 있다. 주요 저서와 논문에 『명사전파술론 (明詞傳播述論)』 (中華書局, 2017), 『북송 (北宋) 사인 (士人) 의 사승 (師承) 과 문학』 (中華書局, 近刊), 「유영 (柳永) 사 (詞) 의 텍스트 중복 및 그 전파 효과에 대한 시론」 (『文學遺産』3, 2022), 「노기의 회망 (回望): 나이토 고난 (内藤湖南) 의 한시 중의 청인 (清人) 과 유청 (遊清)」 (萩原正樹編『日中韓文人交流と相互理解—明治大正期の詩詞を通して』, あるむ, 2020) 등이 있다.